

借用與對峙

——互文性視域下的〈梁武帝累修成佛〉**

陳 煒 舜*

摘 要

收錄於《喻世明言》卷37的〈梁武帝累修成佛〉，一向不太為學者及讀者所注意。這篇小說係以既有典籍為基礎，聯綴改編而成，與眾多的前文本有著顯著的互文性。本文以「借用」與「對峙」為觀照點，將這篇小說分為十五個段落，論述小說文本的建構過程，通過主題、題材、情節與角色的分析，從互文性的視域探論這篇小說的得失。

關鍵詞：梁武帝、互文性、小說、明代、佛教、喻世明言

一、引 言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又稱為「文本間性」，是出現於1960年代的一個重要批評概念，通常被用來指示兩個或兩個以上文本間發生的互文關係。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提出：

Any text is constructed as a mosaic of quotations; any text is the absorp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nother. The notion of intertextuality replaces that of intersubjectivity.¹

收稿日期：2008年5月8日，通過刊登日期：2008年10月15日。

* 作者係佛光大學文學系副教授。

1 Julia Kristeva, "Word, Dialogue and Novel," in Toril Mori, ed., *The Kristeva Reader* (Oxford:

所謂互文性，包括 1. 兩個具體或特殊文本之間的關係（一般稱為 transtextuality）；2. 某一文本通過記憶、重複、修正，向其他文本產生的擴散性影響（一般稱作 intertextuality）。而所謂互文性批評，就是放棄那種只關注作者與作品關係的傳統批評方法，轉向一種寬泛語境下的跨文本文化研究。²

收錄於《喻世明言》卷 37 的〈梁武帝累修成佛〉，³ 以梁武帝為主角，累修成佛為主題，但題材與情節冗贅乏趣，故一向不太為學者及讀者所注意，歷來論者寥寥。史上梁武帝的傳說故事經歷了漫長的演變過程，而〈梁武帝累修成佛〉正是「引文馬賽克」，係在參考多種既有典籍後聯綴改編而成。換言之，〈梁武帝累修成佛〉與眾多的前文本（pretext）有著顯著的互文性。職是之故，本文嘗試以借用與對峙為觀照點，首先論述小說文本的築構過程，然後通過主題、題材、情節與角色的分析，從互文性的視域探論這篇小說的得失。

二、〈梁武帝累修成佛〉文本的築構

〈梁武帝累修成佛〉這「引文馬賽克」的築構過程至今眾說紛紜。中國白話短篇小說雖然在宋代日趨成熟，但一直要到晚明，才出現了「三言」、「二拍」這樣的代表性著作。馮夢龍（1574-1646）編著的「三言」（即《喻世明言》（一名《古今小說》）、《警世通言》、《醒世恆言》）各由四十個獨立故事組成，其中以《喻世明言》問世最早。如申孟所論，《喻世明言》的取材有三個來源，其一是收編宋元話本，加以整理加工；其二是採擇列代史傳、筆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86), p. 66. 按：中文意即：「任何文本都被建構成引文的馬賽克，任何文本都是對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編。文本間性的概念取代了主體間性的概念。」

2 陳永國，〈互文性〉，《外國文學》2003.1 (2003.1): 75。

3 按：此篇篇名，一作〈梁武帝累修歸極樂〉。觀「三言」篇名率為對偶，而該篇之後為〈任孝子烈性為神〉。「成佛」方可與「為神」相對，故本文提及該篇，悉作〈梁武帝累修成佛〉。又：《喻世明言》原名《古今小說》四十卷本，今存有日本內閣文庫所藏天許齋《古今小說》原刻本與復刻本，然皆有殘缺。王古魯比對兩版本，互相補充，拼成較完整的版本，1947年由商務印書館涵芬樓排印，1955年文學古籍刊行社重印。1958年許政揚以重印本為底本，參考《清平山堂話本》和《今古奇觀》加以修訂，並刪節了其所謂「庸俗」和「低級趣味」的內容，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新本。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前人研究整理的基礎上重印此書，內容較許政揚本為完整，故本文據之。

記、戲曲故事敷衍成篇；其三是馮夢龍自編故事。⁴ 申孟又認為，「三言」最大的特點是把口頭講唱文學加以案頭化，既保存了口頭文學的淺俗活潑，又吸收了史傳及唐人傳奇在修辭上的各種手法，自覺地把純文學與民間文學結合，形成了新的文學形式——擬話本，標誌著宋元以來的講唱文學已逐漸脫離口頭創作走向文人創作，從而推動了短篇小說的發展。⁵

〈梁武帝累修成佛〉乃採擇史傳、筆記、佛教故事，聯綴而成，小說作者究竟為馮夢龍，還是另有其人，依然未有定論。如孫楷第認為「三言」中的宋元作品有45種，⁶所列篇目並未包括此篇。據聶付生考證，「三言」中馮夢龍的作品共有24篇，⁷也未包括此篇。鄭振鐸云：「其以武帝前世之妻童氏，轉身為支道林，殊附會得可笑。觀其風格，當為明人作。」⁸ 吳海勇、陳道貴提出，民間流傳的梁武故事確有其吸引力，何妨姑妄聽之，於是馮夢龍在編撰「三言」時，便將擬話本小說〈梁武帝累修成佛〉採入他的《喻世明言》。⁹ 似乎認為此篇乃明人的創作（故以擬話本稱之），但創作者並非馮氏。徐士年以為，此篇的寫作時代難以斷定，風格與明末之擬話本近似，當為明人之作。嚴敦易則以為此篇乃明代中葉以前的擬話本。¹⁰ 目前，學者似乎既難以肯定馮夢龍的著作權，也不易確鑿證明小說作者另有其人。

除《梁書》、《南史》等歷史典籍外，有關梁武帝故事傳說雖多，但長期以來都比較零碎。凌翼雲認為，直到明代以後產生的《梁皇寶卷》，才具備比較完整的梁武帝故事。〈梁武帝累修成佛〉全文約1.3萬字，其中敘郗氏化蟒、託夢求拯拔、梁武帝造《梁皇懺》不過550字，僅佔篇幅的二十四分之一。故事框架是《慈悲道場懺法傳》中的，情節沒有新發展。¹¹ 《梁皇寶卷》

4 申孟，〈前言〉，明·馮夢龍，《喻世明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頁1-2。

5 同上註，頁3。

6 孫楷第，《滄州集》（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2，頁180。

7 聶付生，《馮夢龍研究》（北京：學林出版社，2002），頁213-226。

8 鄭振鐸，《西諦書話》（北京：三聯書店，1983），頁156。

9 吳海勇、陳道貴，〈梁武帝神異故事的佛經來源〉，載於陳允吉主編，《佛經文學研究論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頁366。

10 見（日）小川陽一，《三言二拍本事論考集成》（東京：新典社，1981），頁93。

11 凌翼雲，〈《梁傳》初探〉，載於文憶萱主編，《目連戲研究論文集》（長沙：藝海雜誌編輯部，1993），頁166。

的主要內容除郗后化蟒外，還有臺城之亂等；但與〈梁武帝累修成佛〉相比，「完整性」依然相差甚遠。此殆可從旁證明，作為話本形式的〈梁武帝累修成佛〉不可能出現於宋元。其次，〈梁武帝累修成佛〉的內容冗蕪，並不引人入勝，未必能夠吸引聽眾，不類宋元以來相傳已久的舊話本。復次，不少《梁書》的材料都採入了〈梁武帝累修成佛〉，斧鑿痕跡明顯。而《梁皇寶卷》的對象讀者並非文人，其內容更接近民間文學面貌。舉例而言，「餓死臺城」一節，《寶卷》是如此敘述的：

那侯景道：「老臣有一本啓奏萬歲：如此虔誠修煉，必有昇天之日。臣想東林寺，不是幽靜之所，那眾僧不能盡心修煉。臣保萬歲前往臺城，那城中有一昇天寺，寺中有四時不謝之花，八節有長生之景，況且此城十分幽靜，山青水秀，萬歲前去靜坐，誦經禮拜，朝夕焚香，朝中大事託於太子可管，糧草待老臣解來……」¹²

《寶卷》作者竟謂臺城乃「十分幽靜，山青水秀」的禪修之所，不知其在六朝一直是朝廷臺省和皇宮所在地；又謂侯景本為朝中重臣，為達到篡位目的，哄騙梁武帝前往臺城，似乎侯景之亂純是宮廷政變，與兵燹毫無關聯。無論與《梁書》或〈梁武帝累修成佛〉參看，《梁皇寶卷》都存在顯著的互文對峙。這種與歷史真實相去甚遠的情形是《梁皇寶卷》中的故事在民間長期流傳而造成的。如此似可進一步支持鄭振鐸「明人作」之說。此外，〈梁武帝累修成佛〉的藝術技巧未見高超，在「三言」眾多作品中質量蓋只居中下。以馮夢龍之才情手筆，當不至如斯。固然，從作品表現出來的文化背景和習俗等考察是否宋元舊篇，是比較有說服力的內證。但〈梁武帝累修成佛〉係歷史故事、宗教故事，其呈現的文化背景、習俗和語言不太能反映出時代的特色。因此，筆者傾向以鄭振鐸及吳海勇、陳道貴的說法為基礎，相信該篇是一位不知名的明代文人所編寫的擬話本，後由馮夢龍收入《喻世明言》。雖然不排除馮氏在編纂過程中加工的可能，但最多只是略有潤色而已。

〈梁武帝累修成佛〉一篇的撰寫，到底以哪些材料為前文本，情況不盡清楚。譚正璧窮數十年之功，查閱數百種參考書，輯成《三言二拍資料》，以探究故事的來源出處、影響關聯，然與〈梁武帝累修成佛〉相關的只有《朝野

12 不題撰人，《梁皇寶卷》，載於濮文起主編，《民間寶卷》第2冊（合肥：黃山書社，2005），頁327。

僉載》、《六朝事蹟編類》、《二老堂雜志》、《戲瑕》及《遣愁集》中的七條資料。¹³ 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的〈明代擬話本故事的來源與影響〉一章中，亦列有〈梁武帝累修成佛〉之目，其言云：「本篇敘梁武帝的前身及餓死臺城事。前身說，見《朝野僉載》卷2。餓死說，見《六朝事蹟編類》卷下〈同泰寺〉。」¹⁴ 胡氏自言對譚正璧之書多有取材。譚書〈梁武帝累修成佛〉名下的七條資料中，《六朝事蹟編類》卷上〈總敘門第一·六朝興廢·梁武皇帝〉一條為概述梁武帝生平，持其餘六條的內容與小說對應，不出「梁武帝的前身」、「殺槥頭和尚」、「遊冥府造《梁皇寶懺》」及「餓死臺城」四段情節。¹⁵ 葉德均〈三言二拍來源考小補〉則並無隻字談及此篇。¹⁶ 據日本學者小川陽一考證，郗后化蟒的故事亦見於晚明朱國禎《湧幢小品》及清初周清源《西湖二集》；槥頭和尚的故事亦見於晚明鄭瑄《昨非菴日纂》。¹⁷ 而據筆者統計，〈梁武帝累修成佛〉的情節大抵可分為十五段（詳下文）。相勘之下，譚氏及小川諸書所錄的本事資料甚至不及〈梁武帝累修成佛〉取材範圍的一半。這些資料無法對應的情節，自應另有來源，也有可能出自小說作者的仿作。

由於年代湮遠，典籍零落，有關梁武帝的資料大致以《梁書》及《南史》為主，〈梁武帝累修成佛〉與這兩種正史有明顯的互文性。此外，因為梁武帝好佛，其行跡亦見於《法苑珠林》、《佛祖統紀》、《釋氏稽古略》、《佛祖歷代通載》、《梁皇寶卷》、《梁武帝問誌公禪師因果經》等書，〈梁武帝累修成佛〉向這些佛教典籍的互文借用，也時可見之。此篇的內容情節豐富，為方便起見，謹將之分為十五個段落，這些段落可能有單一情節，也可能是由幾個不同的情節所貫串。現將分段及前文本的情況列表一如下：

13 譚正璧，《三言兩拍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213-216。

14 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550。

15 宋·張敦頤，《六朝事蹟編類》（臺北：廣文書局影印，1970），頁31-32。

16 葉德均，〈三言二拍來源考小補〉，《戲曲小說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566-576。

17 （日）小川陽一，《三言二拍本事論考集成》，頁93。

表一 〈梁武帝累修成佛〉的分段及前文本

段落	內 容	頁碼	前文本
1	梁武帝的前身：曲蟠	356	《朝野僉載》
2	梁武帝的前身：范普能	356-357	待考
3	梁武帝的前身：黃復仁	357-360	待考
4	辯「五月兒刑剋父母」	360	《史記》〈孟嘗君列傳〉
5	李賁謀反	360	《梁書》〈武帝本紀下〉
6	諫齊明帝起兵滅魏	360-361	《梁書》〈武帝本紀上〉
7	受禪稱帝	361-362	《梁書》〈武帝本紀上〉
8	宗廟以粉麵代犧牲	362	《梁書》〈武帝本紀中〉、《佛祖統紀》、《佛祖歷代通載》
9	遊冥府造梁皇懺 (包括酈后化蟒)	362-363	《慈悲道場懺法》、《南史》〈后妃下〉、《佛祖歷代通載》、《六朝事蹟編類》、《戲瑕》、《二老堂雜志》、《梁武帝問誌公禪師因果經》、《梁皇寶卷》、《湧幢小品》、《西湖二集》
10	殺槁頭和尚	363-364	《賢愚經》、《法苑珠林》、《朝野僉載》、《古今譚概》、《昨非菴日纂》
11	造同泰寺供養支道林 (包括沈約之死)	364-365	《梁書》〈沈約傳〉
12	捨身同泰寺	365-366	《梁書》〈武帝本紀下〉
13	修塔退條枝國兵	366-367	待考
14	餓死臺城	367-368	《梁書》〈武帝本紀下〉、《梁書》〈侯景傳〉、《南史》〈梁本紀〉、《南史》〈侯景傳〉、《隋書》〈后妃下〉、《遣愁集》、《梁皇寶卷》
15	湘東王討逆	368	《梁書》〈元帝本紀〉

由表一可見，〈梁武帝累修成佛〉之取材以《梁書》為主，次為佛教典籍，次為其他正史及筆記雜著。在撰構〈梁武帝累修成佛〉的過程中，小說作者對這些固有的前文本進行了加工，如為統一體例、迎合讀者的口味，將之以白話來改寫；為配合情節發展，將之更改、增飾等。這些文本的互文性，頗值得研究。

三、主題的互文借用

主題乃文藝作品中通過具體的藝術形象表現出來的基本思想，是文藝作品內容的核心。顧名思義，〈梁武帝累修成佛〉為一篇果報小說，其主題在於宣揚因果報應。¹⁸ 據表一所列，全文第一至三段、八至十三段都與累修之「因」有直接的關係，除第二、三段可能為小說作者自創外，其餘各段皆出自佛教典籍、或以佛教思想為主體；而第十四、十五段則敘述了成佛之「果」。梁武帝成佛的傳說，可以追溯至正史。如《魏書》云：

衍崇信佛道……每禮佛，捨其法服，著乾陀袈裟。令其王侯子弟皆受佛誡，有事佛精苦者，輒加以菩薩之號。其臣下奏表上書亦稱衍為皇帝菩薩。¹⁹

稱梁武帝為「皇帝菩薩」，只是表明其受菩薩戒的事實而已。隨著時間的推移，梁武帝成佛的傳說漸漸形成。如《梁皇寶卷》云：

人有善愿，天必從之。今有 玉旨下來，即跪聽讀。詔曰：「現有功曹太歲，所奏梁武帝，道德孝義，工程浩大，敕封為第四十八尊羅漢，即大勢至善菩薩，去到西天雷音寺拜見世尊。」²⁰

此外，明代朱星祚《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傳》中，第十三尊「施笠羅漢」即是梁武帝。²¹ 張火慶指出，或因梁武帝在歷史上以帝王的權力所推動的建寺、度僧、說法、捨身及誓斷酒肉、編製《寶懺》等，對中國佛教影響頗大；

18 傅承洲提出，因果報應思想在中國源遠流長，先秦時期便有簡單的因果報應觀念。東漢時期，印度佛教傳入中國，作為佛教的重要思想「業報輪迴說」也隨之流行開來。明代馮夢龍編纂「三言」，受因果報應思想影響很大，在小說史上非常典型。「三言」中的因果報應思想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連篇累牘的議論說教，二是善惡報應的故事情節。果報小說一定有報應，即使小說中的人物相距數千里，時隔好幾代，作者也會用各種方法將他們組合在一起，達到報應的目的。在構思報應情節時，還常用超現實的手法，以佛教的靈魂不死、輪迴轉世思想作基礎，用鬼魂或來世的形式來施報或受報。見氏著，《馮夢龍與通俗文學》（鄭州：大象出版社，2000），頁113-126。

19 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98〈蕭衍傳〉，頁2187。

20 不題撰人，《梁皇寶卷》，載於濮文起主編，《民間寶卷》第2冊，頁329。

21 見明·朱星祚，《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傳》，（《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萬曆乙巳（1605）書林聚奎齋刊印楊氏清白堂原板影印，1990）。

又據聞他曾與達摩相見問答，因此傳說他最後修行成道，且納入民間流行的十八羅漢群中。²² 故〈梁武帝累修成佛〉的篇末，梁將趙伯超在湘州偶遇武帝與支道林，跪奏道：「陛下與長老因甚到此？今要往何處去？」武帝回答道：

朕功行已滿，與長老往西天竺極樂國去。有封書寄與湘東王，正沒人可寄，卿可仔細收好，與朕寄去。²³

薩莫瓦約論述「暗示」(allusion) 這種互文手法，是指文本中一些模糊的跡象表明互文存在。²⁴ 〈梁武帝累修成佛〉在借用《梁皇寶卷》及《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傳》等前文本的「成菩薩」、「成羅漢」主題，進而改換為「成佛」，但又礙於諸種前文本（包括民間信仰）的內容，瞭解無論「皇帝菩薩」、「大勢至善菩薩」還是「施笠羅漢」皆未到達「佛」的級別，故只在內文中籠統地敘述為「往西天竺極樂國去」，僅將標題改換為「成佛」。這正體現出〈梁武帝累修成佛〉與《梁皇寶卷》等著作在主題上的互文借用。

四、題材的互文借用

題材是指文學作品中具體描寫的事件和現象，亦即作者表達主題、塑造形象所用的材料。據前表顯示，與〈梁武帝累修成佛〉有互文性的前文本可分為佛教典籍及偏向於儒家思想的正史及筆記雜著兩大類。而小說作者處理這些題材的方法則各各不同，歸納而言，即薩莫瓦約所說的「暗含—引用」(implication)，也就是指引用完全隱含並融於受文 (texte d'accueil)，絕對深藏不露。「暗含—引用」又可區分為兩種：簡單的和複雜的。²⁵ 本節從上述兩大類前文本中各舉一例，以見此篇在題材上互文借用的情況。

（一）「簡單的暗含—引用」：第十段「殺檻頭和尚」

22 張火慶，《達摩與梁武帝：相關小說研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06），頁 288。

23 明·馮夢龍，《喻世明言》，頁 369。

24 (法) 薩莫瓦約 (Tiphaine Samoyault) 著，邵煒譯，《互文性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頁 50。

25 同上註，頁 51。

對於一些固有的梁武帝故事題材，〈梁武帝累修成佛〉會直接吸納，此即「簡單的暗含一引用」——只是省略了變換陳述的信號（引號、另起一行、註釋），陳述者直面讀者而掠人之美。²⁶如第十段「殺槓頭和尚」：

有個槓頭和尚，精通釋典，遣內侍降敕，召來相見。槓頭和尚隨著使命而來，武帝在便殿正與侍中沈約弈棋。內侍稟道：「奉敕喚槓頭師已在午門外聽旨。」適值武帝用心在圍棋上，算計要殺一段棋子，這裏連稟三次，武帝全不聽得，手持一個棋子下去，口裏說道：「殺了他罷。」武帝是說殺那棋子，內侍只道要殺槓頭和尚。應道：「得旨。」便傳旨出午門外，將槓頭和尚斬訖。武帝完了這局圍棋，沈約奏道：「槓頭師已喚至，聽宣久矣。」武帝忙呼內侍教請和尚進殿相見。內侍奏道：「已奉旨殺了。」武帝大驚，方悟殺棋時誤聽之故，乃問內侍道：「和尚臨刑有何言語？」內侍奏道：「和尚說前劫爲小沙彌時，將鋤去草，誤傷一曲蟻之命。帝那時正做曲蟻，今生合償他命，乃理之當然也。」武帝嘆惜良久，益信輪回報應之理，乃傳旨厚葬槓頭和尚。一連數日，心中快快不樂。²⁷

譚正璧指出，這段故事出自《朝野僉載》卷2：²⁸

梁有槓頭師者，極精進。梁武帝甚敬信之。後勅喚槓頭師，帝方與人碁，欲殺一段，應聲曰：「殺卻。」使遽出而斬之。帝碁罷，曰：「喚師。」使答曰：「向者陛下令人殺卻，臣已殺訖。」帝歎曰：「師臨死之時有何言？」使曰：「師云：『貧道無罪。前劫爲沙彌時，以鋤割地，誤斷一曲蟻。帝時爲蟻，今此報也。』」帝流淚悔恨，亦無及焉。²⁹

此外，這則掌故也往往見於後世傳述，如《古今譚概》卷33〈梁武帝前身是蟻〉條與《朝野僉載》同，³⁰譚正璧指出只是字句稍有改易。³¹小川陽一謂晚明鄭瑄《昨非菴日纂》亦有收錄此事。³²比對之下，〈梁武帝累修成佛〉中

26 同上註。

27 明·馮夢龍，《喻世明言》，頁363-364。

28 譚正璧，《三言兩拍資料》，頁213-214。

29 唐·張鷟，《朝野僉載》（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41。

30 明·馮夢龍，《古今譚概》（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據明刊本影印，1979），卷33，頁1463-1464。

31 譚正璧，《三言兩拍資料》，頁214。

32 （日）小川陽一，《三言二拍本事論考集成》，頁93。按，《昨非菴日纂》一書，今日易見之版本爲《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然查此書卷20〈冥

「殺榼頭和尚」段除了配合故事內容，將對弈之人改為沈約外，大抵可謂《朝野僉載》的白話語譯。復次，爲了配合〈梁武帝累修成佛〉的敘述模式，小說作者又在開篇處增寫了第一段「梁武帝的前身：曲蟾」，以達前後呼應之效。

進而言之，類似的故事在佛教典籍中也有記載。如北魏慧覺等譯《賢愚經》卷4〈出家功德尸利苾提品〉云：

昔過去時，此閻浮提，有一國王，名曰曇摩苾提，好喜佈施，持戒聞法，有慈悲心，性不暴惡，不傷物命，王相具足。正法治國，滿二十年，事簡閒暇，共人博戲。時有一人，犯法殺人，諸臣白王：「外有一人，犯於王法，云何治罪？」時王慕戲，脫答之言：「隨國法治，即案限律，殺人應死。」尋殺此人。王博戲已，問諸臣言：「向者罪人，今何所在？」臣白王言：「隨國法治，今已殺竟。」王聞是語，悶絕躄地，冷水灑面，良久乃蘇。³³

唐代釋道世所編《法苑珠林》卷30〈俗男部·勸導〉亦採入了這個故事，文字與《賢愚經》大致相近。³⁴《賢愚經》的故事與《朝野僉載》有幾個顯著差異：1. 曇摩苾提並非中國君主；2. 曇摩苾提處決之人乃罪犯而非僧人；3. 曇摩苾提在博戲時有回答到大臣之問，其言並非就博戲而發，大臣實際上也並未誤解其言。不過，曇摩苾提篤好佛法，在博戲時因無心之言導致他人死亡，其後又悔恨無已，這樣的情節設計與《朝野僉載》中的梁武帝故事卻非常近似。

吳海勇、陳道貴詳細比對了《朝野僉載》與《賢愚經》的故事內容，認為〈出家功德尸利苾提品〉成爲梁武故事影響源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較之釋典譬喻，衍生於漢地的梁武帝故事在情節湊合方面似更勝一籌。它巧妙地運用象棋遊戲「殺」語與刑殺的詞意偶合，製造了一場原本不該發生的人間悲劇。如此結構，不僅情節趨近天衣無縫，而且使該故事更富有本土氣息。³⁵從以上論述，我們可以理出這個故事題材的發展脈絡：

果），並無「殺榼頭和尚」故事。據編者云，此本原缺第24頁，蓋故事在該頁中爾。

33 北魏·慧覺等譯，《賢愚經》，《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2），頁379。

34 唐·釋道世，《法苑珠林》（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卷30，頁344。

35 吳海勇、陳道貴，〈梁武帝神異故事的佛經來源〉，載於陳允吉主編，《佛經文學研究論集》，頁368。

《賢愚經》《法苑珠林》→《朝野僉載》《古今譚概》→〈梁武帝累修成佛〉

《賢愚經》是《朝野僉載》的前文本，《朝野僉載》又是〈梁武帝累修成佛〉的前文本；《朝野僉載》將《賢愚經》的主角改寫為中土的梁武帝，又有待於〈梁武帝累修成佛〉的小說作者將之全盤語譯為白話。其互文關係，不言而喻。

（二）「複雜的暗含—引用」：第二段「辯『五月兒刑剋父母』」

所謂「複雜的暗含—引用」，其陳述變換是有標識的，但表面所謂陳述者非事實上的話出此言者：這裡並不掩蓋引用的行為，但是一個虛構的陳述者將一個真正的、未被提及的陳述者的話語據為己有。³⁶如小說第二段「辯『五月兒刑剋父母』」，小說作者移花接木地從其他正史中截取片段，轉嫁在梁武帝身上：

衍以五月五日生，齊時俗忌傷剋父母，多不肯舉。其母密養之，不令其父知之。至是，始令見父。父親說道：「五月兒刑剋父母，養之何為？」衍對父親說道：「若五月兒有損父母，則蕭衍已生九歲；九年之間，曾有害于父母麼？九歲之間，不曾傷剋父母，則九歲之後，豈能刑剋父母哉？請父親勿疑。」其父異其說，其惑稍解。³⁷

考此段故事的內容，蓋源自《史記》〈孟嘗君列傳〉：

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可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³⁸

《梁書》謂梁武帝於「宋孝武大明八年甲辰歲（464）生」，³⁹《南史》所載相同。⁴⁰至其九歲時，乃宋明帝泰豫元年（472），尚未入齊。且《梁書》與《南

36 （法）薩莫瓦約著，邵煒譯，《互文性研究》，頁51。

37 明·馮夢龍，《喻世明言》，頁360。

38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75〈孟嘗君列傳〉，頁2352。

39 唐·姚思廉，《梁書》，卷1〈武帝本紀〉，頁1。

40 唐·李延壽，《南史》，卷6〈梁本紀上〉，頁168。

史》不記梁武帝生辰，亦未言其九歲前由母「密養」。蓋兒童「長與戶齊」，約在八、九之齡，故小說將此故事設於九歲。《史記》所記載孟嘗君的辯解，是從「戶」字展開；而小說省去「長與戶齊」之語，故僅云「九歲之間，不曾傷剋父母，則九歲之後，豈能刑剋父母哉」。儘管二者辯解的內容有所不同，目的卻是一樣：都強調自己在「密養」的過程中沒有刑剋父母，因此以後也不會。

不過，小說謂「五月兒刑剋父母」乃「齊時俗」，有一定的依據。《宋書》〈王鎮惡傳〉：「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⁴¹ 可見以「五月兒刑剋父母」，而須寄養在外的習俗，自先秦至六朝皆然。抑有進者，《警世通言》中〈陳可常端陽仙化〉一篇，講述陳可常生於五月五日，被算命先生論定為：「命有華蓋，卻無官星，只好出家。」於是陳可常作詩嗟嘆云：「齊國曾生一孟嘗，晉朝鎮惡又高強。五行偏我遭時蹇，欲向星家問短長。」然而，陳可常歷經磨難，最後仍修成正果。⁴²

由是而觀之，「辯『五月兒刑剋父母』」一段以《史記》〈孟嘗君列傳〉為主要的前文本，而以《宋書》〈王鎮惡傳〉為輔。在小說中，梁武帝就是一個虛構的陳述者，他將真正的、未被提及的陳述者——孟嘗君的話語據為己有，因而予讀者以早慧的印象。此外，陳可常最終能夠仙化，無疑意味著即使命格不佳，依然可以靠修煉而成佛。〈梁武帝累修成佛〉的作者將梁武帝的生日定於五月五日，大概可與陳可常的故事互文見意。

五、情節的互文借用

情節是指敘事作品中表現人物之間相互關係的一系列生活事件的發展過程。它是由一系列展示人物性格，表現人物與人物、人物與環境之間相互關係的具體事件構成。為了加強故事性，小說作者往往在前文本的故事基礎上增加一些情節。這些情節多引用、模擬自與梁武帝故事無涉或關係甚小的其他文本。現舉二例，以見該小說前文本之夥。

41 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45〈王鎮惡傳〉，頁1365。

42 明·馮夢龍編，《警世通言》（臺北：三民書局，1992），頁59。

（一）情節的黏合：第十一段的沈約之死與支公預言

在〈梁武帝累修成佛〉中，支公（道林）是一個重要角色。如第十一段「造同泰寺供養支道林」敘及沈約之死：

沈約懇求禪旨指迷，支公與沈約口號云：「栗事護前，斷舌何緣？欲解陰事，赤章奏天。」紙後又寫十來個「隱」字。一日，豫州獻二寸五分大栗子，梁主與沈約各默書栗子故事。沈約故意少書三事，乃云：「不及陛下。」出朝語人曰：「此公護前。」蓋言梁主護短也。後梁主知道，以此憾約。斷舌之事，約與范雲勸武帝受禪，約病中夢齊和帝以劍割其舌。約恐懼，命道士密為赤章奏天，以禳其孽。都是沈約的心事，無人知得，被支公說著了。沈約驚得一身冷汗，魂不附體，木呆了一會，又再三拜問「隱」字之義。支公為何連寫這十來個「隱」字？日後沈約身死，朝議欲諡沈約為文侯。梁主恨約，不肯諡為文侯，說道：「情懷不盡為『隱』。」改其諡為隱侯。⁴³

本段中的主要情節——「栗事」、「赤章」、「迫諡」等事，皆來自《梁書》〈沈約傳〉。如栗子事：

約嘗侍譚，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⁴⁴

相較之下，可知小說作者只是將栗子從「寸半」改為「二寸五分」，以誇張其大，復將「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簡單敘述為「後梁主知道，以此憾約」。整體而言，並未作大幅度的修改。赤章之事，《梁書》云：

初，高祖有憾於張稷，及稷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尚書左僕射出任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為婚家相為，大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內殿。約懼，不覺高祖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而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以劍割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高祖遣上省醫徐瑒視約疾，還具以狀聞。⁴⁵

43 明·馮夢龍，《喻世明言》，頁364。

44 唐·姚思廉，《梁書》，卷13〈沈約傳〉，頁243。

45 同上註，頁242-243。

據《梁書》之言，「夢齊和帝以劍割其舌」雖然是沈約赤章奏天的直接原因，但導火線則係梁武帝與沈約君臣間有關沈之親家張稷的爭論。小說作者為免節外生枝，略去了君臣爭論部分，直接表述為沈約「與范雲勸武帝受禪」，因此令道士赤章奏天「以懷其孽」。至於諡號為「隱」，《梁書》云：

（梁武帝）及聞赤章事，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有司諡曰文。帝曰：「情懷不盡曰隱。」故改為隱云。⁴⁶

比較之下，不見於《梁書》的情節，主要就是支道林對沈約所說的口號，以及「寫十來個『隱』字」。這個與預言有關的情節，雖是小說作者所增補，卻非純然虛構。小說中的支道林乃是以梁僧寶誌為原型，而歷史上的寶誌又以預言著稱，《高僧傳》謂其與人言語，始若難曉，後皆效驗；時或賦詩，言如讖記。世稱「誌公符」。⁴⁷ 小說中支公關於沈約的預言，大抵是小說作者杜撰；但歷史上真正的所謂「誌公符」，仍有載於史籍者。如《南史》云：

始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為詩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復有四，城北火酣酣。」帝使周捨封記之。及中大同元年，同泰寺災，帝啓封見捨手迹，為之流涕。帝生於甲辰，三十八，剋建鄴之年也。遇災歲實丙寅，八十三矣。四月十四日而火，火起之始，自浮屠第三層。三者，帝之昆季次也。⁴⁸

浮屠第三層失火，象徵著崇佛的梁武帝走到了末日。梁武帝的命運，似乎一早就為誌公所預示。如此看來，小說中的支公預言沈約命運的這一情節，是以《高僧傳》及《南史》為前文本，加以仿作而成。回觀前引《梁書》，梁武帝聞赤章事而大怒的情形，並未在小說中敘及，以致讀者未必能瞭解此事對沈約的影響。實際上，小說作者正是要刻意淡化兩件事之間的關係，從而渲染支道林之神異。

（二）情節的改寫：第十四段的「侯景納溧陽公主」

其次，小說作者也會採用一些與梁武帝關係不大、甚至無關的故事，改寫其中的情節，並納入小說文本。如第十四段「餓死臺城」，提到了侯景納溧

46 同上註，頁243。

47 見梁·釋慧皎撰，湯用彤校註，《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394-397。

48 唐·李延壽，《南史》，卷7〈梁本紀中〉，頁224。

陽公主之事：

（侯景）聞溧陽公主音律超眾，容色傾國，欲納為妃。遂使小黃門田香兒，以紫玉軟絲同心結兒一奩，並合歡水果，盛以金泥小盒，密封遺公主。公主啓看，左右皆怒，勸主碎其盒，拒而不納。公主曰：「不然，非爾輩所知。侯王天下豪傑，父王昔曾夢獼猴升御榻，正應今日。我不束身歸侯王，則蕭氏無遺類矣。」遂以雙鳳名錦被，珊瑚嵌金交蓮枕，遺侯景。景見田香兒回奏，大悅，遣親近左右數十人迎公主。定情之夕，景雖狎毒萬端，主亦曲為忍受。日親不移，致景寵結，得以顛倒是非，妨於朝務，保全公族，主之力也。後王偉勸景廢立，盡除衍族，主與偉忤，愛弛。⁴⁹

這段文字，主要以《南史》〈梁本紀下·簡文帝〉為前文本：

初，景納帝女溧陽公主，公主有美色，景惑之，妨於政事，王偉每以為言，景以告主，主出惡言。偉知之，懼見讒，乃謀廢帝而後間主。苦勸行殺，以絕眾心。⁵⁰

正史中的溧陽公主乃簡文帝之女，亦即梁武帝的孫女；而侯景納溧陽公主之事，在簡文帝繼位之後，與梁武帝並無直接關係。由於小說情節並未涉及簡文帝，故小說作者將之改為梁武帝之女。《南史》僅云「公主有美色」，而小說作者則謂其「音律超眾，容色傾國」。《南史》只簡單講到侯景因美色而「妨於政事」、公主與王偉交惡，小說則敷衍成：公主為了保全皇族，暗中破壞侯景的施政，才不得已委身下嫁。

不過，僅以《南史》為前文本，故事性大概尚不算強。為了令這段故事更為豐盈，以及迎合世俗對桃色故事的興趣，小說作者還採用了其他正史中的情節。如侯景「使小黃門田香兒，以紫玉軟絲同心結兒一奩，並合歡水果，盛以金泥小盒，密封遺公主。公主啓看，左右皆怒，勸主碎其盒，拒而不納」。這段文字，很可能參考了《隋書》〈后妃傳〉的記載：

俄聞上（隋文帝）崩，而未發喪也。夫人與諸後宮相顧曰：「事變矣！」皆色動股慄。晡後，太子（煬帝）遣使者齎金合子，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惶懼，以為鳩毒，不敢發。使者促之，於是乃發，見合中有同心結數枚。諸宮人咸悅，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却坐，不肯

49 明·馮夢龍，《喻世明言》，頁367-368。

50 唐·李延壽，《南史》，卷8〈梁本紀下〉，頁1110。

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⁵¹

當然，宣華夫人與小說中的溧陽公主的態度甚不相同，二人左右的想法也剛好相反。但是，隋煬帝送同心結與宣華夫人的情節，與小說中侯景的行徑卻頗為類似。且宣華夫人接受隋煬帝的饋贈，便可保全左右的宮人，這與小說中溧陽公主委身侯景以保全皇族的情況也有相近之處。再如小說中，溧陽公主謂「父王昔曾夢獼猴升御榻」等語，出自《南史》〈侯景傳〉：

（侯景）既南奔，魏相高澄悉命先剝景妻子面皮，以大鐵鑊盛油煎殺之。女以入宮為婢，男三歲者並下蠶室。後齊文宣夢獼猴坐御牀，乃並煮景子於鑊，其子之在北者殲焉。⁵²

比較可知，歷史上「夢獼猴坐御床」是北齊文宣帝高洋。作者在小說中借溧陽公主之口，謂梁武帝有此夢，不過是為了強調公主委身侯景的動機。隋煬帝烝宣華夫人及北齊文宣夢獼猴兩個故事，本與梁武帝並無關係。但是，小說作者卻改寫了其中的情節，納入梁武帝故事，使之更為引人入勝。

六、角色的互文借用

作為小說主角的梁武帝，本身就是從眾多前文本中借用而來的。至於其他角色，有借用自與梁武帝相關的典籍而略作加工者，如郗后、沈約、昭明太子、侯景等；有借用自這些典籍而進行改換者，如李賁、蕭懿等；有借用自其他典籍而作黏合者，如支道林；也有在既有前文本角色的基礎上發揮（amplifier）者，如黃復仁、童小姐等。本節試舉支公及李賁二者為例，論析小說作者如何將時空及身分作出改置，以見〈梁武帝累修成佛〉在角色上互文借用的情形。

（一）從東晉支公到梁代支公

為了進一步呈現「累修成佛」的主題，令故事情節更加連貫，小說作者安排了一個顯眼的角色：支道林。歷史上的高僧支道林名遁（314-366），一生幾乎都在東晉度過，其逝世去梁武帝出生之年（464）達一世紀之久，二人

51 唐·魏徵，《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36〈后妃傳〉，頁534。

52 唐·李延壽，《南史》，卷80〈侯景傳〉，頁2015。

行年絕不相接。但在〈梁武帝累修成佛〉中，支道林卻成了關鍵角色：他的前身是童家小姐，即梁武帝前身黃復仁的妻子；今生又深受梁武帝敬重，被供養在同泰寺；昭明太子成為「屍蹶」，支道林讓他起死回生；條枝國入侵，梁武帝親自去同泰寺「與道林長老求個善處道理」；梁武帝餓死臺城後，「往西天竺極樂國去」，也是與支道林同行。足見其在小說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即使在前文本與支道林無涉的題材中，也每每添入了這個角色。如第五節所論沈約的故事，在《梁書》中與支道林可謂毫無關係，而〈梁武帝累修成佛〉則將栗子、赤章及謚號三事以支公的一段口號貫串起來，以收烘雲托月之效。再如梁武帝首次捨身同泰寺，其前文本《梁書》的記載非常簡單：

（大通元年）三月辛未，輿駕幸同泰寺捨身。甲戌，還宮，赦天下，改元。⁵³

而在小說作者筆下，梁武帝此次捨身是因為昭明太子成為了「屍蹶」。他起誓道，假如支道林讓太子起死回生，「朕情願與太子一同捨身在寺出家」。於是，當支道林救回太子後：「梁主致齋三日，先著天廚官來寺裏辦下大齋，普濟群生，報答天地。梁主與太子就捨身在寺裏。」⁵⁴ 梁武帝捨身遂成為了對支道林的報答之舉。梁武帝此次捨身，前後只有三日。如何還宮，《梁書》未有確切記載。但觀同書記載他第二次捨身的經過：

（中大通元年秋九月）癸巳，輿駕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因捨身，公卿以下，以錢一億萬奉贖。冬十月己酉，輿駕還宮，大赦，改元。⁵⁵

以此推之，大通元年第一次捨身還宮，大概也是百官籌措鉅款贖身的結果。而〈梁武帝累修成佛〉云：

梁主、太子在寺裏一住二十余日，文武臣僚、耆老百姓都到寺裏請梁主回朝。梁主不允。太后又使宦官來請回朝，梁主也不肯回去。支公夜裏與梁主說道：「愛欲一念，轉展相侵，與陛下還有數年魔債未完，如何便能解脫得去？陛下必須還朝，了這孽緣，待時日到來，自無掛礙。」梁主見說依允。⁵⁶

如此一來，梁武帝此次的還朝，也成了支道林的勸諫之功。

53 唐·姚思廉，《梁書》，卷3〈武帝本紀下〉，頁71。

54 明·馮夢龍，《喻世明言》，頁365。

55 唐·姚思廉，《梁書》，卷3〈武帝本紀下〉，頁73。

56 明·馮夢龍，《喻世明言》，頁365-366。

小說中支道林的原型，是南朝的寶誌和尚。據《高僧傳》記載，寶誌（418-514），一作保誌，世稱寶公、誌公，金城（江蘇句容）人，俗姓朱。凌翼雲指出：「和梁武帝相交的誌公有時又被說成支公——佛教界歷史名人支道林。」⁵⁷而早於〈梁武帝累修成佛〉產生的《梁皇寶卷》中，寶誌已佔了很大的戲份，如替梁武帝解夢而被拜國師，解說武帝及郗后的前世等。《高僧傳》又謂誌公善爲預言，世稱「誌公符」。梁武帝建國，頗爲優禮，寶誌得以出入禁內。梁武帝常與之談論佛經義理，且詢及國家大事。⁵⁸傳世《梁武帝問誌公禪師因果經》，便是二人談論的紀錄。而〈梁武帝累修成佛〉中的支道林，與寶誌相似之處有五：1. 小說往往稱支道林爲支公，支公、誌公，一調之轉。2. 小說中的梁武帝夢遊冥府後「與眾僧議設盂蘭盆大齋，又造《梁皇寶懺》」，雖僅云「眾僧」而已，然尋繹文理，「眾僧」自當以支道林爲首。而傳世《慈悲道場懺法》，正題爲寶誌所作。3. 小說中，支道林對沈約誦一口號，說中其心事，這口號正與「誌公符」相類。4. 小說謂梁武帝將「支公供養在同泰寺，一年有餘」。現南京雞鳴寺（前身即同泰寺）大門側有誌公臺，即爲紀念寶誌而名。5. 小說中，梁武帝有不少國家大事都諮詢支公的意見，這與《高僧傳》中梁武帝詢問寶誌相合。從《高僧傳》到《梁武帝問誌公禪師因果經》、《梁皇寶卷》，寶誌的高僧形象已經日漸突出。不過，大概小說作者認爲支道林聲名較寶誌爲顯，加上支、誌音近，故將其所處的時空由東晉改置於蕭梁，且把寶誌的傳說互文借用於支公身上，如此似可加強梁武帝成佛的說服力。

（二）從梁末土民李賁到齊末刺史李賁

對於《梁書》的某些內容，小說作者作了大刀闊斧的改造。如第五段「李賁謀反」，〈梁武帝累修成佛〉言及梁武帝孩提之際發生的李賁謀反事件。故事略謂齊明帝時有刺史李賁謀反，僭稱越帝，置立官屬，朝命將軍楊瞞討賁。楊瞞每問計於蕭懿，蕭懿推薦姪兒蕭衍。瞞見衍舉止不常，遂虛心請問。蕭衍知無不言，使瞞歎異驚伏，依計而行，果然大破李賁。而蕭衍也

57 凌翼雲，《〈梁傳〉初探》，載於文憶萱主編，《目連戲研究論文集》，頁163。

58 見梁·釋慧皎撰，湯用彤校註，《高僧傳》，頁394-397。

「名譽益彰，遠近羨慕，人樂歸向」。⁵⁹ 這段近四百字的敘述，幾乎泰半屬於虛構改造。現僅將《梁書》有關李賁的記載臚列於下：

是歲（大同七年），交州土民李賁攻刺史蕭諮，諮輸賂，得還越州。⁶⁰

（八年）遣越州刺史陳侯、羅州刺史寧巨、安州刺史李智、愛州刺史阮漢，同征李賁于交州。⁶¹

（九年）夏四月，林邑王破德州，攻李賁，賁將范脩又破林邑王於九德，林邑王敗走。⁶²

十年春正月，李賁於交趾竊位號，署置百官。⁶³

（中大同元年春正月）癸丑，交州刺史楊暉剋交趾嘉寧城，李賁竄入屈獠洞，交州平。⁶⁴

（太清二年春正月）己未，以鎮東將軍、南徐州刺史邵陵王綸爲平南將軍、湘州刺史、同三司之儀，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蕭淵藻爲征東將軍、南徐州刺史。是日，屈獠洞斬李賁，傳首京師。⁶⁵

比較《梁書》與〈梁武帝累修成佛〉，可知以下幾點：1. 李賁乃交州土民，並非刺史；2. 討伐李賁的楊暉乃交州刺史而非將軍；3. 李賁之亂發生在大同七年（541）至太清二年（546），前後擾攘六年之久，當時梁武帝已值晚年，絕非登基前的少年；4. 少年蕭衍向楊暉提供的「破賁之策」內容大率屬於創作，李賁之亂的平定也與梁武帝沒有直接關係。此外，觀〈梁武帝累修成佛〉所言，李賁之亂大約在齊明帝之時。然《梁書》謂梁武帝於「宋孝武大明八年甲辰歲（464）生」，至齊明帝即位的建武元年（494）已屆弱冠，不可謂「幼小」。

那麼，小說作者爲甚麼把李賁之亂的發生時間由梁末前挪至齊末，將李賁由交州土民「升格」爲刺史，且謂楊暉平定李賁是用了少年蕭衍的計策呢？筆者認爲，這是小說作者的藝術誇張。李賁之亂相對於整篇小說的主線

59 明·馮夢龍，《喻世明言》，頁360。

60 唐·姚思廉，《梁書》，卷3〈武帝本紀下〉，頁87。

61 同上註。

62 同上註。

63 同上註，頁88。

64 同上註，頁90。

65 同上註，頁93。

來說，關係比較疏遠，不必敘及，也難以敘及。因此，小說作者將這段歷史材料作出了較大膽的改寫。將時間挪至梁武帝即位前，且謂楊暉採用了少年蕭衍的計策，是爲了體現、突出其早慧；將李賁「升格」爲有權有勢的刺史，則是要誇大這場動亂的規模及平定它的難度。與支公／寶誌故事的互文借用相比，李賁之亂在時空改置上的跨度也許不及，但角色身分的改置卻更爲大膽。只有「僭稱越帝，置立官屬」的簡約敘述尚能令讀者回憶起《梁書》中「竊位號，署置百官」之史實的影子。

七、〈梁武帝累修成佛〉的互文對峙

張火慶以爲：「從儒或從佛的觀點，史學界對梁武帝不同的評價，或永無定論；卻說明了這個人物的精彩，而留下許多討論與想像的空間。」⁶⁶ 梁武帝精彩而猶待評說的經歷，一直引起著後世的注意。吳海勇、陳道貴指出：從南朝梁末到有唐，關涉梁武帝的神異傳說已透露出以神話虛構代替史實的話語傾向。從有唐至明清，這種非理性趨勢更日益增強。⁶⁷ 這就是小說〈梁武帝累修成佛〉出現的緣由。然而，即使小說作者主觀上被梁武帝的事蹟吸引，客觀而言，〈梁武帝累修成佛〉與「三言」其他的故事相比，實在不算上乘。前文分別從主題、題材、情節、角色四方面討論了這篇小說互文借用的情況。難於諱言的是，因爲小說作者在書寫的過程中採用了大量的前文本，而這些前文本之間互文對峙的情況，並未在彙整、吸收、改寫、仿作時得到有效的改善，因此，小說文本無可避免地產生了缺失和紕漏。本節仍從主題、題材、情節、角色四方面分目探討之。

（一）主題的互文對峙

顏尚文指出，梁武帝既要維護、擴展其現實的政治權力，又要追求人生究極的理想，這是難以兼顧也很難統合的大矛盾。梁武帝在這種大矛盾中創造出「皇帝菩薩」的新理念與新政教結合政策，結合中國與印度的文化，使

66 張火慶，《達摩與梁武帝：相關小說研究》，頁 235。

67 吳海勇、陳道貴，〈梁武帝神異故事的佛經來源〉，載於陳允吉主編，《佛經文學研究論集》，頁 367。

儒家「聖王思想」與佛教「轉輪聖王」思想合一。這是順應魏晉南北朝長期分裂，以及思想未定於一尊而衍生出的「合一」之時代需求的產物。如果把這看做是時代價值與潮流的體現，則梁武帝不愧為「時代之子」、「時代之父」、「六朝士大夫的典型」。⁶⁸ 梁武帝政教合一的實驗失敗了，他本身就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物，不僅在儒佛之間徘徊，即使佛家對梁武帝的評價也並不一致。因此，儘管本小說的主題是「累修成佛」，但正如張火慶所說，從敦煌本《壇經》、《歷代法寶記》開始，達摩的事蹟中就有了梁武帝，且視為相對性的角色，讓世人了解「武帝著邪道，不識正法」。禪門對於梁武帝的偏見，其實也是唐宋之佛教僧侶在「反佛」論戰中，主動與梁武帝「劃清界線」的共識——因為梁武帝晚景餓死國亡，給了歷代反佛者一個論證的實例。但無論如何，因為梁武帝的扶助與崇信，促成南朝佛教的盛況，故此梁武帝一直存有兩種形象。⁶⁹ 誠然，佛教典籍中關於梁武帝與達摩問答的內容，絲毫不見小說採用。如《佛祖歷代通載》云：

師入朝，帝問：「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並無？」師曰：「人天小果，有漏之因。雖有，非實。」帝曰：「何謂真功德？」師曰：「淨智妙明，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於世求。」⁷⁰

從兩人的對話中，可以看出梁武帝慧根未夠，還欲以造寺、寫經、度僧等事來向達摩炫示自己的功德，結果達摩並不表示讚嘆，反而忠言逆耳，令梁武帝不太高興，達摩也一葦渡江前往北魏。這相對小說「累修成佛」的主題，產生了強烈的互文對峙，負面影響甚大。抑有進者，梁武帝會見達摩的故事歷來流傳甚廣，即使小說作者視而不見，不以其為前文本，卻無法阻止讀者在閱讀小說時聯想起這個故事。如此一來，小說作者對這個故事避而不言，反而欲蓋彌彰，進一步削弱了「累修成佛」的可信度。

（二）題材的互文對峙

68 顏尚文，《梁武帝》（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9），頁318-319。

69 張火慶，《達摩與梁武帝：相關小說研究》，頁233-235。

70 元·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據至正七年（1347）釋念常募刻本影印，1988），卷9，頁13b-14a。

〈梁武帝累修成佛〉的前文本可分為兩類。一類為與佛教相關的典籍，一類為正史、筆記、雜著等。佛教典籍的題材，如「宗廟以粉麵代犧牲」、「遊冥府造梁皇懺」、「殺槥頭和尚」等，皆有濃厚的果報思想。另一方面，由於梁武帝佞佛，加上晚節不保，儒家的史官對他貶多於褒。正史、筆記、雜著的題材，多少繼承了史官傳統，難以對梁武帝作全面的肯定。這些歷史性的前文本是以「內聖外王」的思想為方針，本身未必具有佛教的果報思想。即使如前文所引《南史》中誌公預言梁武帝命運的故事，雖然有涉怪力亂神之嫌，但史官之所以採用，並非刻意為因果報應思想作宣傳，大概只是要帶出：即使佛教中人不認為梁武帝的佞佛會有好的結局。故此，為了把這兩種思想有所扞格的題材融合在一起，不得不作一些加工。

可是，小說作者的加工卻不很成功。如小說第七段謂沈約乃黃復仁的女侍轉世，與梁武帝自然義氣相合。⁷¹ 然而第十一段抄撮《梁書》，謂護短的梁武帝勒令賜沈約以惡諡。可見諸種前文本題材之間的扞格，直接導致了文本的前後文牴觸。復如第七段敘述梁武帝受禪稱帝，謂齊主蕭寶卷「惟喜遊嬉，荒淫無度，不接朝士，親信宦官」，於是蕭衍「密修武備，招聚驍勇數萬」，以致齊主也知道蕭衍「有異志」。⁷² 從儒家的角度來看，即使君主無道，忠臣也不應蓄謀篡逆。佛教雖不強調忠君，但弑君之事終係罪業，與「成佛」修行背道而馳。再如第十四段「餓死臺城」，梁武帝「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遂輕信見朱异「宇內混一之兆」的逢迎之說，率爾收納侯景。侯景知道臨賀王蕭正德「屢以貪暴得罪于梁主，正德陰養死士，只願國家有變」，因此與蕭正德密約，遂詐稱出獵起兵。然而，梁武帝既不曉得侯景是「反復凶人」，也不瞭解蕭正德與景暗通，「反令正德督軍屯丹陽」。⁷³ 這與其解釋為梁武帝坦蕩樂善，毋寧說是其晚年昏瞶的表現。

第七、十一、十四段的內容，大率以《梁書》、《南史》等為前文本，而這些正史的記載則不無微言大義，對梁武帝的行徑有所貶抑。觀《梁書》〈武帝本紀贊〉可知：「及乎耄年，委事羣倖。然朱异之徒，作威作福，挾朋樹黨，政以賄成，服冕乘軒，由其掌握，是以朝經混亂，賞罰無章。『小人道

71 明·馮夢龍，《喻世明言》，頁362。

72 同上註，頁361。

73 同上註，頁368。

長』，抑此之謂也。」⁷⁴ 綜而論之，這些儒家故事的題材與佛家故事本來就有不可調和的矛盾。小說作者將這些對峙的文本共冶一爐，勢必導致文本的主題搖擺不定，甚至影響情節發展的脈絡。

（三）情節的互文對峙

「三言」是以「奇情」招徠讀者的，如〈蔣興哥重會珍珠衫〉、〈沈小官一鳥害七命〉等作品的內容皆是。其次，隨著話本由口傳文學演進為書面形式，成為案頭的消遣品，其讀者群的知識水平自然也大大提高。然而，〈梁武帝累修成佛〉的大部分情節都是從正史、筆記、佛典中抄撮改寫而來，不僅以文人為主體的讀者對於梁武帝的這些故事大概原本就了然於胸，即使對市井小民來說，這些故事也大都予人似曾相識之感，並不新鮮，因此吸引力也不夠。進而言之，小說作者從《梁書》中選取的材料太富，人物太多，時間跨度太長。洵如張火慶所論：梁武帝是一位值得關注敘寫的歷史人物，只是他的一生太豐富、精彩，很難找到適當的切入點。⁷⁵ 小說作者似乎也察覺了這些問題，故嘗試盡量縮短故事的時間跨度，以便於情節的順利推進。⁷⁶ 但是，小說在時間的交代上依然導致情節的扞格。如開篇說梁武帝的前身范普能是「齊明帝朝盱眙縣光化寺一個修行的」，到了第五段「李賁之亂」，仍在齊明帝朝。據《南齊書》的記載，齊明帝在位前後只有五年，這在晚明大概是一般文人的常識。但小說中的齊明帝在位期間，不僅經歷了范普能、黃復仁兩世，大約齊明帝去世後，蕭衍方才成人，建立梁朝。小說中與正史中齊明帝的在位時間，無疑產生了互文對峙。

其次在結構上，作為果報小說的〈梁武帝累修成佛〉在情節上可說是「前因後果式」與「一報還一報式」的結合：就「累修成佛」的主題而言，前

74 唐·姚思廉，《梁書》，卷3〈武帝本紀下〉，頁97-98。

75 張火慶，《達摩與梁武帝：相關小說研究》，頁323。

76 按：如歷史上的梁武帝生於劉宋之世，小說第六段則謂其在齊明帝時尚是小兒。據歷史記載，梁武帝於大通元年捨身同泰寺時，昭明太子已經二十七歲。而小說卻言昭明太子此時年僅六歲。小說第十二段中，梁武帝在捨身後，「太后又使宦官來請回朝」。實際上，此時的梁武帝已經六十四歲，母親早已故世，宮中並無太后。溧陽公主本為梁武帝孫女、簡文帝之女，小說第十四段則以其為武帝之女。這些更動，大抵都是有心為之，改寫之後的故事效果確也更強。

文的若干小故事就是因，是累修的內容，後文「朕功行已滿，與長老往西天竺極樂國去」就是果，亦即成佛。但是，這些小故事之間的因果關係卻未必很強。如前文所論，第一段「梁武帝的前身：曲蟾」當是小說作者在第十段「殺槁頭和尚」的基礎上增補的，故兩段之間有因果關係。然而，這樣的例子在小說中並不多。退一步講，故事情節失去前後照應的情況更時而有之，如小說第七段云：

黃復仁化生之時，卻原來養娘轉世爲范雲，二女侍一轉世爲沈約，一轉世爲任昉，與梁公同在竟陵王西府爲官，也是緣會，自然義氣相合。⁷⁷

沈約、范雲乃梁武帝的開國功臣，《梁書》記載斑斑可考。小說作者在此補上一筆，自是爲了加強轉世故事與沈約、范雲二者的聯繫。但在同段中，沈、范二人如何「義氣相合」爲梁武帝鞠躬盡瘁，敘述鮮艷，只是在後文「沈約之死」中補敘性地帶出沈氏「與范雲勸武帝受禪」而已。沈約、范雲對整篇小說情節發展的影響也可說微乎其微，乏善足陳。此外，第十一段抄撮《梁書》，講到沈約死後，梁武帝未能不念舊惡，必將其改諡爲「隱」而後快，這無疑更突出了梁武帝「護短」的性格，梁武帝與沈約並非如前文所講那般「義氣相合」。採自《梁書》的沈約故事非但未能如作者之願，爲果報思想服務，反揭露了梁武帝的性格缺陷，削弱了其「成佛」的說服力，還導致情節在推進的過程中產生背逆。從這些互文對峙，可知小說作者對情節的駕馭能力並不高強。

（四）角色的互文對峙

傳承洲說得好：「我們讀這類果報小說，總感到美中不足，人物性格鐵板一塊，很少發展變化，與複雜的人性有較大距離，這固然有短篇小說的篇幅限制，更重要的原因是作者必須將筆下的人物分個善惡，並給予相應的報應，達到勸善懲惡的目的。」⁷⁸ 在〈梁武帝累修成佛〉的某些段落中，我們看得到小說作者在描摹角色個性方面的努力。如第十二段「捨身同泰寺」，當昭明太子「口眼緊閉，不知人事」時，梁武帝舐犢之情溢於言表。⁷⁹ 然而在更

77 明·馮夢龍，《喻世明言》，頁362。

78 傳承洲，《馮夢龍與通俗文學》，頁122。

79 明·馮夢龍，《喻世明言》，頁365。

多與因果報應有關的段落中，對角色個性的描摹依然不足，難以感染讀者。如黃復仁與童氏的夫妻之情、梁武帝與郗皇后的夫妻之情、梁武帝與溧陽公主的父女之情等，都是可以大力著墨之處，但小說的敘述卻予人以欲振乏力之感。

試觀這篇小說的主角梁武帝。歷史上的梁武帝本身就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物。他不僅是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也是位學者、文學家，在南齊時已名列竟陵王蕭子良「八友」之一，且知識淵博，好學不倦，著述豐富，提倡文化不遺餘力，使南朝出現空前的文化盛況。而另一方面，他既然要成佛，卻仍以殺伐立國，與達摩話不投機，晚年昏聩，對沈約的態度更見其胸襟之狹窄。如此的矛盾，正是梁武帝悲劇產生，以及後世對他褒貶難定的直接原因。而小說竭力將梁武帝塑造成一個正面人物以宣揚報應之說，未免過於簡單化，以致梁武帝身上那種充滿深刻矛盾的悲劇感也就無從呈現。與此同時，大約因為前文本情節有限，小說作者又不得不挪用正史以及佛教典籍中某些呈現為負面形象的梁武帝材料，試圖加強作品的故事性。但如此一來，小說作者根本難以如願。這些材料自然會與累修成佛的主題產生牴觸，就一個修行者來說，好殺、護短、昏聩等性格實在未足與議。

再看次要人物。作者嘗試盡量減少人物的出場，如齊和帝、范雲、任昉、昭明太子、梁簡文帝等人，與梁武帝關係皆頗為密切，在小說中則簡單帶過，甚或略而不提。然如前文所言，與梁武帝「義氣相合」的沈約、范雲在小說中的戲份甚少。此外又如重要角色昭明太子在第十二段「捨身同泰寺」之後便無端消失，這無疑令前後文失去了照應。再如小說明言梁武帝「憂憤成疾，口苦索蜜不得，荷荷而殂，年八十六歲」。⁸⁰而第五段「李賁謀反」，梁武帝向楊暉獻計曰：「足下引大軍屯於淮南，以一軍與陳霸先抄賁之後。」⁸¹至第十五段「湘東王討逆」，又謂「王僧辯、陳霸先攻破侯景」。⁸²梁武帝為小兒時，陳霸先已經領兵；至其八十六歲餓死臺城後，陳霸先尚能攻破侯景，則陳氏之壽高力強，洵無與倫比。此實乃小說作者虛構李賁之亂的故事角色時，因不審而導致的文本對峙。

80 同上註，頁368。

81 同上註，頁360。

82 同上註，頁368。

八、結 語

「三言」「兩拍」是宋元兩代說書人的話本及明代文人創作的擬話本，其題材極大部分取自前代史傳、唐宋小說、稗官雜記，或者是民間流傳的神話故事等。⁸³ 而梁武帝故事流傳久遠，作為「引文馬賽克」的〈梁武帝累修成佛〉存在著高度互文性，擁有眾多前文本。本文以為，〈梁武帝累修成佛〉是一位不知名的明代文人所編寫的擬話本。馮夢龍在編纂「三言」時，去取態度頗為嚴謹，但他又特別強調通過文學作品來向世人說教，因此這篇小說便登列於《喻世明言》之中——換句話說，這篇小說的傳教目的遠多於娛樂目的，宗教意義也超越了文學意義。為便論述，本文將這篇小說分為十五個段落，以借用與對峙為觀照點，通過主題、題材、情節與角色的分析，從互文性的視域探論其得失。主題方面，小說作者借用史書中梁武帝受菩薩戒的記載，以及寶卷、小說中成羅漢、成菩薩的傳說，將小說主題設定為「累修成佛」。題材方面，從第十段「殺榼頭和尚」及第二段「辯『五月兒刑剋父母』」的分析，可見小說作者借用《賢愚經》、《朝野僉載》、《史記》、《晉書》等前文本，以「暗含—引用」的方法，或挪用固有的題材，或將本不屬於梁武帝的題材嫁接其身。情節方面，有如第十一段將沈約之死與支公預言兩個在前文本中毫不相干的情節黏合一處者；有如第十四段借用《隋書》「隋煬帝悉宣華夫人」、《南史》「高洋夢獼猴坐御床」等情節，改寫後置於「侯景納溧陽公主」故事之中者。角色方面，有借用自其他典籍而作黏合如支道林者，有在前文本基礎上發揮如李賁者。儘管如此，由於前文本眾多，而融匯不足，〈梁武帝累修成佛〉一作存在著嚴重的互文對峙。如小說中梁武帝成佛的述說，與佛典有關其與達摩話不投機的記載，有主題的互文對峙。小說所採納史傳紀錄對梁武帝的貶抑，與佛典故事對果報思想的渲染，有題材的互文對峙。既點出梁武帝與沈約義氣投合，又敘述梁武帝護短導致沈約之死，有情節的互文對峙。梁武帝形象不一致、昭明太子驟然消失等，有角色的互文對峙。這些互文對峙嚴重影響到作品的素質，也減少了讀者的興趣。

83 譚正璧，《三言兩拍資料》，〈出版說明〉，頁1。

梁武帝生前與佛教有著密切的關係，這在後世形成了深刻的記憶。故此，梁武帝對佛教的優禮，佛教徒一直津津樂道，他與達摩的話不投機，也不斷被傳述；另一方面，其佞佛的行徑長期受到儒家的批判。據《莊子》〈天地〉篇記載，華封人祝帝堯「多福、多壽、多男子」，⁸⁴「三多」正是傳統中國人寤寐所求之事。歷史上的帝王如唐玄宗、清高宗等，福、壽、男子皆多，且頗有個人魅力，故即使中道荒怠，依然為國人所樂道。若非晚年餓死臺城，梁武帝的「三多」及個人魅力大概與唐玄宗、清高宗不相伯仲，後世評價或許更為正面，其形象在民間也更受歡迎，甚至可以成為佛教徒的模範，其「三多」的生活也可解釋為信佛的福報。兇死的事實雖不能迴避，卻尚可從佛理上來詮解：梁武帝的前三世——曲蟾、范普能、黃復仁都累修積善，故今生的兇死也就微不足道了。在佛教觀念中，兇死、犯戒各有前因，同樣屬於修行生涯的環節。如東漢高僧安清則死於他人刀下；⁸⁵ 晉代高僧鳩摩羅什曾犯下色戒，《高僧傳》記載後秦君主姚萇「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⁸⁶ 因此，梁武帝性格雖有缺陷，又餓死臺城，與其成佛卻並不矛盾。小說〈梁武帝累修成佛〉的文本就是在這種認知基礎上，吸收眾多的前文本而形成的。〈梁武帝累修成佛〉全文僅約1.3萬字，屬於短篇小說。在有限的篇幅裡，要有技巧地把作為「公眾人物」的梁武帝近九十年的事蹟講述清楚，甚至還要包括他前身的行徑，實非易事。因此到了清初，天花藏主人將梁武帝的故事重新編成十卷四十回的長篇小說《梁武帝西來演義》。而學者仍認為《梁武帝西來演義》不注重故事情節和人物性格，結構鬆散，文字平平。⁸⁷ 蓋此書作者未嘗不以前人為鑒，卻始終難以避免〈梁武帝累修成佛〉的缺失。歷史上的梁武帝有著政治家、軍事家、學者與文學家的多重身分，與儒釋道皆存在著密切的關係，因而具有複雜的性格，其行事導致當時與後世各有迥然不同的評價，也誘發眾多的故事、傳說。這些故事、傳說在互文借用，也在互文對峙，既為新互本的產生提供了參照，也往往令新互本的內容產生不可調和

84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頁416。

85 梁·釋慧皎撰，湯用彤校註，《高僧傳》，頁5。

86 同上註，頁53。

87 侯忠義，〈前言〉，清·天花藏主人新編，《梁武帝西來演義》（《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頁2。

的矛盾。梁武帝故事之魅力，以及書寫之難，由此可知；而新互文之繼續出現，也是可以預見的。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梁·釋慧皎撰，湯用彤校註，《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
- 北魏·慧覺等譯，《賢愚經》，《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2。
- 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唐·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唐·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唐·魏徵，《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唐·張鷟，《朝野僉載》，北京：中華書局，1979。
- 唐·釋道世，《法苑珠林》，上海：商務印書館據萬曆刊本縮印，1935。
- 宋·周必大，《二老堂雜志》，《筆記小說大觀》六編，臺北：新興書局，1974。
- 宋·張敦頤，《六朝事蹟編類》，臺北：廣文書局影印，1970。
- 元·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據至正七年（1347）釋念常募刻本影印，1988。
- 明·朱星祚，《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傳》，《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萬曆乙巳（1605）書林聚奎齋刊印楊氏清白堂原板影印，1990。
- 明·馮夢龍，《古今譚概》，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據明刊本影印，1979。
- 明·馮夢龍編，許政揚校註，《古今小說》，臺北：里仁書局，1991。
- 明·馮夢龍編，《喻世明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明·馮夢龍編，《警世通言》，臺北：三民書局，1992。
- 明·錢希言，《戲瑕》，《筆記小說大觀》十七編，臺北：新興書局，1977。
- 清·張貴勝，《遣愁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27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上海圖書館藏康熙二十七年（1688）刻本影印，1995。
- 清·天花藏主人新編，《梁武帝西來演義》，《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據清初刊本影印，1996。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

不題撰人，《梁皇寶卷》，載於濮文起主編，《民間寶卷》第2冊，合肥：黃山書社，2005。

不題撰人，《梁武帝問誌公禪師因果經》，載於濮文起主編，《民間寶卷》第11冊，合肥：黃山書社，2005。

二、近人論著

(日)小川陽一 1981 《三言二拍本事論考集成》，東京：新典社。

吳海勇、陳道貴 2004 〈梁武帝神異故事的佛經來源〉，載於陳允吉主編，《佛經文學研究論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頁360-369。

胡士瑩 1980 《話本小說概論》，北京：中華書局。

凌翼雲 1993 〈《梁傳》初探〉，載於文憶萱主編，《目連戲研究論文集》，長沙：藝海雜誌編輯部，頁157-171。

孫楷第 1965 《滄州集》，北京：中華書局。

張火慶 2006 《達摩與梁武帝：相關小說研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

陳永國 2003 〈互文性〉，《外國文學》2003.1: 75-81。

傅承洲 2000 《馮夢龍與通俗文學》，鄭州：大象出版社。

葉德均 1979 《戲曲小說叢考》，北京：中華書局。

鄭振鐸 1983 《西諦書話》，北京：三聯書店。

聶付生 2002 《馮夢龍研究》，北京：學林出版社。

顏尚文 1999 《梁武帝》，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法)薩莫瓦約(Tiphaine Samoyault)著，邵煒譯 2005 《互文性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譚正璧 1980 《三言兩拍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Kristeva, Julia. 1986. "Word, Dialogue and Novel." In Toril Mori, ed., *The Kristeva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pp. 34-61.

Adaptation and Parallelism: An Intertextual View of “Liang Wu Di lei xiu cheng Fo”

Nicholas L. Chan*

Abstract

“Liang Wu Di lei xiu cheng Fo” (梁武帝累修成佛, Emperor Wu of Liang attains Buddhahood through accumulative practice), a short story contained in *Yu shi ming yan* 喻世明言, is seldom noticed by scholars and readers. It is an adaptation based on anecdotes in certain classical work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se texts is still readily apparent. Dividing the story into fifteen parts and investig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x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tory through intertextual analysis of its theme, subject matter, plot, and character role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daptation and parallelism.

Keywords: Liang Wu Di 梁武帝, intertextuality, short story, Ming dynasty, Buddhism, *Yu shi ming yan* 喻世明言

* Nicholas L. Cha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Literary Studies at Fo Guang University.